

清洁生产机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融合发展研究

庄琳

吉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DOI:10.12238/eep.v3i12.1177

[摘要] 清洁生产和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均针对工业企业,即工作对象存在一定的重叠;同时,清洁生产和碳排放权交易在企业实施过程中,重点均与能源与环保相关联。因此,两者存在着共同开展的可能,并可在工作资源上可共享,进而提升工作效率。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于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推动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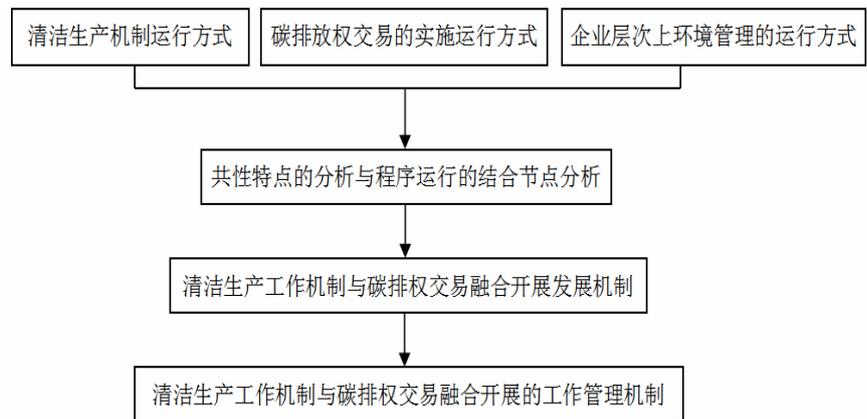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DF468 **文献标识码:** A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哥本哈根会议,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促进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碳信用交易将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备商品属性进行公开交易,是实现碳减排的核心经济手段。清洁生产机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融合发展研究是在当前机构改革,职能合并的大形式下,对现有两项减排重要措施手段相结合的探索性研究。

1 提升工作效率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指政府机构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每个份额为一份排污权。政府在排污权一级市场上,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



当前,清洁生产和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均针对工业企业,即工作对象存在一定的重叠;同时,清洁生产和碳排放权交易在企业实施过程中,重点均与能源与环保相关联。因此,两项工作存在着共同开展的可能,并可在工作资源上可共享,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2 两项工作彼此验证

在具体的工作中,两项工作的成果可彼此提供佐证,为最终各自成果的准确性做出保障贡献。

如在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第二阶段(评估阶段)要对企业的资源能源及产排污情况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数据的评估分析。此阶段的工作成果大部与碳排放的相关数据有关联,可直接验证碳排放的相关数据

3 优化行政管理

在新的机构改革的框架要求下,清洁生产与碳排放权交易将由以往的分部门管理方式转变为统一的部门管理。清洁生产与碳排放权交易两项工作的融合,一方面与新的管理方式相适应,另一方面将提升行政管理效率。

清洁生产和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均针对工业企业,存在着共同开展的可能,并可在工作资源上可共享,进而提升工作效率。在具体的工作中,两项工作的成果可彼此提供佐证,为最终各自成果的准确性做出保障贡献。在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要对企业的资源能源及产排污情况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数据的评估分析。此阶段的工作成果大部与碳排放的相关数据有关联,可直

接验证碳排放的相关数据。在新的机构改革框架要求下,清洁生产与碳排放权交易将由以往的分部门管理方式转变为统一的部门管理,一方面与新的管理方式相适应,另一方面将提升行政管理效率。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如果简单观察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各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比重情况,并不能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提升了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以及改善了空气环境,因为这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难以衡量政策的真实效果。影响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因素不仅仅有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各地区的工业化率、能源消费水平、环境治理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等。某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重较高,并不一定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导致的;某地区大气环境改善效果明显,也可能是环境治理投资的作用。因此,要研究这一科学命

题,需要比较各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清洁生产行为,可以引入上文介绍的双重差分法来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中国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效果。

4 结束语

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各种极端天气现象频繁发生,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碳信用交易的产生为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要根本上降低CO₂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必须为企业搭建平台实现国内碳信用交易。因而,针对我国发展碳信用交易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从企业生产入手,加大企业的清洁生产力度,从源头削减碳排放量,并寻找与其相符合的碳排放交易模式。

[参考文献]

[1]靳云汇,刘学,杨婉华.清洁发展机制与中国环境技术引进[J].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2001,18(2):24-28.

[2]李荣刚,张小宁.清洁发展机制(CDM)与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J].农业工程技术(新能源产业),2007,(5):41-44.

[3]潘竟虎,赵轩茹.基于空间回归模型的中国碳排放空间差异模拟[J].环境科学学报,2018,38(7):2894-2901.

[4]钟小剑,黄晓伟,范跃新,等.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特征、动力机制与趋势—基于国际经验比较[J].生态学报,2017,37(1):331-340.

[5]郭升选,李娟伟,徐波.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中的问题、成因及其对策[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11.

[6]Robert N S.Transactions Costs and Tradable Permit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5,29(2):133-148.

[7]Crocker T D. The Structuring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s [J].Emissions Trading Programs,2001,(5): 11-20.